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行纪

卷之二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意)马可波罗(Polo, M.)著;冯承钧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12 (2000. 5重印)

书名原文: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ISBN 7-80622-554-4

I. 马... II. ①马... ②冯... III. 马可波罗-游记
IV. K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第25845号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装帧 柯国富

马可波罗行纪

冯承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17.5 字数 440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ISBN 7-80622-554-4/K · 74

定价: 26.00元

前 言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七百多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无疑是位先驱者,其所著《游记》家喻户晓,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今天,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马可·波罗学。

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随从他的父亲尼哥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Maffeo)自家乡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旅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此后又到大都(北京)。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后,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回国后,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海上战争中被俘,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难友比萨人鲁思悌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这即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见闻录》。

《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

纪实的手法，叙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代大都的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众所周知，在元帝国时期，欧洲有不少旅行家、商人来过中国，他们回国后大都写有行纪，而记载最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可·波罗游记》。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先后在法国、意大利以至在欧洲诸国流传，极大地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眼界和对中国的认识，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著名的探险家哥伦布就很爱读马氏《游记》，《游记》对富庶东方的描述，使他非常钦慕中国的文明富裕，并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了他冒险远航的决心。1492年他率船队进行第一次探险时，便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要到中国和印度来。至今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中所存他的遗物中尚有拉丁文译本的《游记》一册。

《游记》首次向西方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的大门，然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部与中国极有关系而又与中国人隔膜长达六百多年的“奇书”才渐为国人所知晓。据现有的材料，中国之介绍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最早约始于1874年。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第264号上刊有求知子的《询意国马君事》，北京同文馆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22号上有映堂居士写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率先介绍了马可·波罗的事迹及其《游记》。后来洪钧著

《元史译文证补》，其中也引用了《游记》的材料，但他并不懂外文，只是靠译人据域外史料摘引片断译文。至20世纪初以后，《游记》在中国才有正式的译本出现。

《游记》共有五种译本：第一个汉译本为清末魏易、林纾合译，起先逐日刊登在汪康年主办的《京报》上，1913年由北京正蒙书局出版，名为《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此后张星烺曾翻译亨利·玉尔(Henry Yule)和科迭(Henri Cordier)合订的英文译注本，但20年代仅出版了《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和第一卷，以后未再续出。第三种即冯承钧据法国沙海昂(A.H.Charignon)法文译注本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李季据美国曼纽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oroff)编订的英文本译出的《马哥孛罗游记》出版。1937年张星烺又出版了他根据拜内戴托(L.F.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全文，新译本仍名《马哥孛罗游记》。在以上的几种汉文译本中，以冯承钧译本较为审慎完备，被公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1949年前印过三次，以后又由中华书局重印过，因而流传也最为广泛。此次重印的，便是这一冯译本。

这里需要把译者冯承钧先生及冯译的情况介绍一下。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武昌)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杰出的翻译家。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精通法、英、德、意、比、拉丁、梵、蒙、藏诸种文字，以毕生精力从事著述和翻译，在蒙元史、中国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不少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一生著译达百余种，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把他列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

他青年时曾游学欧洲，1903年被派往比利时学习，1905年入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念法学预科。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曾

参加过留法学生中的革命团体。1907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获法学学位，转入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巴黎期间，曾用中文指导西方的汉学研究者，由此结识了伯希和、沙畹、鄂卢梭等一些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留欧八年间，冯氏受到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对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国内形势的感染，毅然归国，返回武昌，担任革命后湖北都督府秘书。1913年赴京任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自1914年起，转任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秘书，此后历任专门教育司第三科金事、科长。在教育部任职的同时，1920年后还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政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致力于蒙元史、西北史地、南洋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29年，因患风瘫，遂辞职居家，专事著述。健康稍复后，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的长期编译。1932至1938年该会拨专款资助他翻译中外交通史和蒙元史的汉学名著，出版了多种译作。抗战时期，他因病困居北平，治学未辍。抗战胜利后，各大学从西南迁回北平，他又再度出任临时大学史学教授，不幸积劳成疾，于1946年2月9日以肾炎不治逝世。所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地名》、《成吉思汗传》、《元代白话碑》、《景教碑考》、《历代求法翻经录》等书，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蒙古史略》、《交广印度两道考》、《郑和下西洋考》、《苏门答刺古国考》等外国汉学名著数十种，并撰译了大批专题论文，多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及《西域南海史地论著辑》。

冯承钧先生的学术眼界相当开阔，他是我国较早提出“民族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对中外文化之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历史有关

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皆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译序》）基于这种“文化之互相灌输”的认识，他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汉学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其学术贡献的重要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他在蒙元史研究中，鉴于《游记》是参证元史的一部重要域外著作，而此书“在旧译本中既无完本善本”，便决定将它重新译出，以为元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详尽、准确的资料。

比较旧译，冯译的一大优点是在版本的选择上较为审慎完备。《游记》问世以来，各种抄本、译本不下百种，大致可分为原写本、改订本、合订本三类。各本间相互歧异甚多，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以1938年出版的伯希和、穆勒合译的注本最为后出也为最好。冯氏在翻译时，伯氏的译注本尚未出版，他以各版本间互有长短，难于取舍，故采取了将各种重要版本的写法衰辑校勘，择其立说较优者为底本，而于附注中并存异说的办法。经比照对勘，他选择当时较为完备的法国沙海昂所编定的新注本为底本。沙氏将诘聱难读的旧法文转为新法文体，并参考了除拜内戴托之外的诸重要版本，注释详细，能采诸本之长；又因他1899年来华后，曾任京汉路工程师、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等职，通晓中文，在注释校订中利用了中國史籍中的资料，因而具有他本所没有的一些优点。在译书时，冯氏还尽量搜集、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诸重要版本，如地学本、颇节(G. Pauthier)本、刺木学(Ramusio)本、玉尔-科迭本、拜内戴托本等。

冯译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翻译与考证辨误相结合。他在书中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一流的翻译水平，而且融入了其潜心研究的成果。如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及其在汗廷的地位、任务，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议。法国汉学家颇节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

祖忽必烈时的枢密副使孛罗，也就是出使波斯不归、后协助拉施都丁修史的那个孛罗，1865年出版时并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孛罗本书》。此后西方学者多从此说。沙海昂注本受此影响，沿而不改。中国学者李季、李思纯均持此说。张星娘的两个译本也都名为《马哥孛罗游记》，并作长篇考证，认定马可·波罗与孛罗同为一人。冯氏在《行纪》译序中，参考了伯希和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他列举三证，指出：考《元史》本纪，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御史大夫、大司农、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认为“仅据《元史》本纪之文，已足证此种考证之伪”，《元史》“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孛罗，彰彰明矣”。又据程钜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碑》及拉施都丁《史集》等书，证明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薛奉使之宗王阿留浑所后留波斯不归者应为同一孛罗，而与《游记》作者马可·波罗毫不相干。从而确定马可·波罗绝不是元枢密副使孛罗，澄清了这一沿误已久的重要问题。冯译并摒弃了“马哥孛罗”的旧译，改称“马可波罗”，从此这一新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译书过程中，冯氏还注重取中外史籍互相比对，考订史实，往往以“钩案”的形式附注于后，以求做到融会贯通。由于《游记》成书时的疏误和版本流传中的混乱，书中的人名地名、道里方向错讹间出，名称的考订成为“马可·波罗学”中的重要问题。有时一名考释之误，还可能累及全局。沙海昂原本中有不少舛误，冯氏在译作中，除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作了许多详细的史地考证，在附注中予以说明。删削了沙氏注释中一些杂芜、牵合的部分，对沙氏原书中错误的注释，尽可能一一予以订正，作出比较正确的解释；沙氏注释未详或应注未注之处，亦为之补注不少。这需

要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普通的译书匠所能办到。其中许多注释材料,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因此,其译著本身就是专门家的研究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行纪》的史料价值。

冯氏译文以直译为主,他的翻译文质相兼,力求做到无违原本,语言质朴平实,较好地保存了原书风味,加以注释博洽,考订审慎,因而深受学界推重。其后,虽有张星烺、李季等几个译本,但诸本中仍数冯译较为审慎和完善,在学术界和读者的影响也最大。其译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迄今仍是我们研读《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译述水平较高,译注内容较为丰富,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种译本。

邬国义

1999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序

马可波罗书的中文译本，我所见的有两本。初译本是马儿斯登(Marsden)本，审其译文，可以说是一种翻译匠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考据家的成绩。后译本是玉耳、戈尔迭(H. Yule-H. Cordier)本，译文虽然小有舛误，译人补注亦颇多附会牵合，然而比较旧译，可以说是后来居上。惟原书凡四卷，此本仅译第一卷之强半，迄今尚未续成全帙。

马可波罗书各种文字的版本，无虑数十种，戈尔迭在他的《马可波罗纪念书》中业已详细胪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原写本，如颇节(Pauthier)本之类是；一类改订本，如刺木学(Ramusio)本之类是；一类合订本，如玉耳本之类是。版本既多，各有短长，很难于中加以取舍。不过我以为能将各重要版本的写法裒辑校勘，详加注释，其余似可不成问题。

我近来很想缩小研究范围，专在元史一方面搜集材料，所以大胆地译了一部多桑书。马可波罗书也是参证元史的一部重要载籍，旧译本中既无完本善本，我也想将其转为华言。相传此书是初用法文写成，而现存之诸法文本所用的文体，几尽是旧文体，很难畅读。本书注者沙海昂既将颇节本转为新文体，而出版时又在1924年至1928年间，可以说是一部比较新的版本。除开别奈代脱(Benedetto)本晚出(亦在1928年出版)沙氏未能参考外，他参考的重要版本为数不少。这是我翻译此本的重要理由。

沙海昂原法国籍，清末国籍法颁布，首先归化中国，民国任

交通部技正有年，是一铁道专家，于公馀之暇从事考据。这部注释可以说是一种好事者(amateur)的成绩，也不是一种纯粹考据家的作品，所以也免不了若干舛误，而于材料亦昧于鉴别。可是现在的汉学名家，是决不肯牺牲许多年的光阴，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业的。本书叙言开始引证烈缪萨(A. Rémusat)的一段话，就是使人望而却步的一个大原因。既然不能求各方面的专门家通力合作，一个人学识无论如何渊博，终归要出漏洞的。伯希和对于此书虽然颇多指摘(参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然而要知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况且沙氏的成绩不能说毫无优点。他将颇节本革新，使人能通其读，又将各方面的注释采摭甚繁，虽然不免有珠玉沙砾杂陈之病，可能辑诸注释家众说之长，使后来研究的人检寻便利，这是他本所未有的。

此书既然有些缺点，所以我的译本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好的注释一概转录，牵合附会之文则不惜删削。删削的大致以第五十九章以后为多。我原来计算第一卷的译文有十二万字，后经我删削者有六分之一，但仅限于不得不删的文字。此外只须其微有裨于考证，虽所引的是《辞源》之文，仍予采录。此外我仍用前译多桑书的译法，凡地名、人名有旧译者，尽先采用，考订未审者则录其对音。

沙氏沿袭颇节的错误，仍以马可波罗是元代枢密副使孛罗，致使华文译本有以孛罗为本书标题者。伯希和对此辩之甚详。我以为不用多说，仅据《元史》本纪之文，已足明此种考订之伪。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又考程钜夫《雪楼集·拂林忠献王神道碑》及刺失德丁书，至元二十一年偕爱薛奉使至宗王

阿鲁浑所，后留波斯不归中国者，应亦为同一孛罗，亦与此波罗毫不相涉。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曰马哥孛罗。

现在马可波罗书的威权，当首数伯希和。戈尔迭从前撰玉耳本补注时，曾大得伯希和之助。沙氏注此本时，可惜有若干篇伯希和的考订文字未曾见着。读此书者必须取伯希和诸文参看。第一卷校勘既毕，特志数语于端。

1935年2月20日冯承钧命儿子先恕笔受讫

叙 言

“校勘一部马可波罗(Marco Polo)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要作这种事业,必须确知中世纪的地理,东方的历史,此时代旅行家的行记,当时同现在鞑靼人(Tartares)、印度人同其他亚细亚民族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风俗,同世人不大认识的出产。既确知矣,尚须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的鉴别。这些事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挚,很难兼而有之。”(见烈缪萨[Abel Rémusat]撰《亚洲杂纂新编》第一册 382 页)

这些话绝对不错。我们作此事时,业已有这种感想,必须一个博学的人,才能够注释马可波罗书。这是我们所欠缺的。从前有几个朋友劝我们将这部“世界奇异书”刊行一种新版本,我们颇受这种事业的诱惑。可是我们所认识的马可波罗书,同众人所认识的一样。我们曾经读过,赞赏过,并承认过,颇节(G. Pauthier)、玉耳(H. Yule)、戈尔迭(H. Cordier)同其他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不少问题所刊布的那些博识的注解,我们老实以为关于这个旅行家的研究,业已详尽无馀。我们所以要必须尝试,是因为这个物掇齐亚(Vénitie)人的行记,在意大利文、英文、德文书中,不难用贱价买得一本;乃在法文书中,要觅取一部可读的马可波罗书,除开沙尔通(E. Charton)的译文(《古今旅行家》第二册)外,必须觅求贵价而难得的版本,像伯尔日隆(Bergeron)版本之类(《12世纪、13世纪、14世纪、15世纪中的亚洲行记》,1735年海牙La Haye本),或是像几乎不能见的1556年的译本之类(《东印度有名州城

的地志，同其居民的风俗法律志，……》，物搨齐亚贵人马可波罗撰)。所可惜者，法文书中并无一部适应大众的读本，像1907年蓝克(Hans Lemke)博士采玉耳同颇节的注释所刊布的德文本之类。所以只能见着伯尔日隆译文的那些重刊本，而这种刊本不附注释，同旧法文的原译本一样难读。如此看来，外国人在他们的译本中不难读马可波罗书，而我们既难读旧法文本，只能见着一些引文，而且是些脱漏不完全的引文。

这皆是驱使我们执笔的理由。我们意思仅在翻译一部业已注释而易读的本子，将其文体略为更新，可是仍将它的朴直而意味深长的文格保存。当然我们选择的是1867年注释丰贍的颇节本，同时并利用玉耳同戈尔迭最近的注释。版本之选择，并无其他理由，因为纵在今日，如果要指定马可波罗书的一部善本，虽然我们偏向刺木学(Ramusio)本，仍不免承认1824年的巴黎地理学会本，具有最初笔录的风味，较之马可波罗本人改订的那些本子，易于了解。复次，刺木学本虽然详备(因为世人拟此本是马可波罗的最后补订本)，似乎有些后来窜入之文。可是各本皆有它的好处，必须互相参校。我们并不想规仿玉耳的尝试，将诸本合并为一本，因为各本对于一事时常叙述各异。比方第七十三章，有些本子说阔里吉思(George)国王是天德(Tenduc)君主长老约翰(Prêtre-Jean)以后的第六个君主，有些本子仅说他是长老约翰的曾孙，其说皆有理由，未便取舍也。

我们的工作，一直到行近东突厥斯单(Turkestan)的时候，很顺利，可是到了此地，才知道困难；到了中国本部，又见许多游移不定的名称之考订，未免虚构；这些名称的考订，不能仅据欧洲人的撰述，必须考证中国的载籍。

幸而现代的中国学者研究到中世纪的情形、注意到中亚细亚的历史同蒙古人之侵略，他们曾将马可波罗书译释。这是些新的

贡献，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利用。但是我们常在可能限度中引证其考证之文。其中有一人，是张君星焯，曾研究过波罗在中国所执的政治任务，其研究成果已刊布于《地学杂志》中，他正在预备一部马可波罗书的刊本，可是不知在何日出版。

波罗此种政治任务，此时未便说明，后在结论中述之，因为有不少点，学者尚未发表意见，远东法国学校校长鄂卢梭(L. Aurousseau)君将别有一种研究也。比方读刺失德丁(Rachid-eddin)的序文，足以使人惊异者，据说刺失德丁修史时，曾得一名Polo(钩案：此误。以后所言波罗的政治任务并误。伯希和对此已有纠正，可参观本书附录《〈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沙海昂后在本书第三册后亦自纠其误，并悔误采中国学者无根附会之说)者之助，此人来自契丹(Cathay)，在本国曾为大元帅及丞相，“他认识突厥诸部的历史及起源，尤其是蒙古族的历史及起源，非他人所可及”。

马可波罗回西方时，曾止于波斯宫廷，必曾见过刺失德丁。只取其所记东方鞑靼历史诸章审之，其细节同刺失德丁本人的记载很符，此点毫无疑义。核对年代，好像可以参证波罗曾为刺失德丁合撰人之说，因为刺失德丁书成于1307年，乃奉合赞汗(Khan Ghazan)之命而撰(合赞汗在位始1294终1303年，又据别一说，始1295终1304年)，其撰人初为医师也。总之，刺失德丁所志此波罗丞相之大元帅的官号，恰与《元史》本纪所载枢密副使的官号相符。元朝只有皇太子能作枢密使，若是再考此人参与阿合马案件的情形，颇节所考马可波罗即是《元史》枢密副使李罗一说，竟可确定。

又若马可波罗所记忽必烈(Koubilai)讨伐蒙古诸叛王，同诸叛王互相争战的事迹，表示他完全知悉他们的争端、他们的兵额。如果他在军职中未占一个重要位置，他如何能知这些消息？若是